

XiANTAN

ZHONG GUO WEN REN



闲弹中国文人

赵金铭 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闲弹中国文人

赵金铭/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闲弹中国文人/赵金铭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6.2

ISBN 7-80696-305-7

I. 闲... II 赵...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6358 号

闲弹中国文人

赵金铭/著

出版人/刘文君

*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http://www.tjabc.net>

E-mail: tjgcbbs@yahoo.com.cn

天津市津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79000

2006 年 2 月第 1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80696-305-7

定 价: 15.00 元

序

刘泽华

中国向来以世界文明的中心自许。从秦汉一统到康乾盛世，天朝上国化陋泽远，像阳光一样照耀着四周荒凉之地。“文”是中华文明的动力和机制，是中华民族的荣耀与风流：“斯文”乃国脉所系，世运攸关。

何谓文？《易·系辞下》称：“物相杂，故曰文。”文即世界中的色彩和花纹——列星旋转，草本枯荣，莺歌燕舞，还有河图洛书等等有意味的形式以及人类所创造的文明之物，既包括先王创立的典章制度，也包括器具、文字、图画以及个人的仪态举止、服装饰品等，都是“文”。“文”是具象的意义，是“道”的显现。取象乎天文，错综乎人文，就能经纬天地，化成天下，故《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在谈到谥法时称“经纬天地曰文”。对个体的人来说，“文”就是其“质”的表现。在诸子当中，儒家尤其注重“文”对于君子人格的成就作用。《韩诗外传》卷八载冉有对哀公问：“臣闻之，虽有良玉，不刻镂则不成器。虽有美质，不学，则不成君子。”通过自我刻镂成“文”，使内在美质呈现出来，一个自然人才成为一个“文”人，成为“君子”。故当棘子成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时，子贡反驳说：“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鞶，犹犬羊之鞶。”（《论语·颜渊》）成为一个“君子”，就是要做到内实外美，文质彬彬。因此孔子要求弟子们“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通过学文，个体进入先王开创的传统之中，进入秩序的规范之内；通过自身的文饰，“君子”成为展示天道的工具，成为叙述着天道的“文本”——如果社会是一

块素绢，“文人”就是上面的花纹，它使人类社会摆脱野蛮状态而凸显人的意义。

作为“文”的承担者和阐释者，“文人”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牢牢占据了主流地位，帝王们马上打来天下每每要找来儒生共同治理。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为专制王权的大一统作了理论准备，且完善了专制统治的十八般利器；汉朝儒生则通过制礼作乐的宗教化运动，把帝王推上了圣人的宝座。从汉代开始，以儒家为主的人文整体全面参与到了专制王权的运作之中，成为专制权力的贯彻者，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守护人。缘此，中华民族成就了人类历史上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景观——系人伦于天理，融道德于政治的政治哲学和社会结构、组织方式，并建立起了曾经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文官制度。

综观文人的历史，可谓大浪淘沙，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既有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也充斥了规行矩步的真小人；既有经世致用的国家栋梁，也充斥了空谈心性的社会蛀虫；既有仁人志士的高风亮节，又多捐客讼棍的穷酸恶俗；既有李白的狂放，杜甫的真诚，又有张居正的机变，海青天的愚忠。志士风骨与奴才嘴脸，独立意愿与权力心结，天下情怀与小圈子意识，大地山河与风花雪月，道德文章与书画琴棋……鱼珠并陈，风尘缭乱。“仁以为己任”的天下书生们依违于进退之间，彷徨于公私之际，既挺起了民族的坚强脊梁，也造就了传统最腐臭的渊薮。

本书以文人为题，缘文论史，既有逆流而上的追溯，又有沿波而下的浏览；既有严肃的研究讨论，又有轻松的撷英拾趣。一卷在手，古今入抱，风流满怀，非独文心益智，亦可助谈资，发幽怀，遣偶然之兴。

他在报人和学者之间

姜维群

报人，报纸编辑也。学者，任人皆知的一个词。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既不必合并同类项，也无须冰炭不相容。在科技益发进步的今天，学科愈分愈细的今天，报人仅是报人者日渐其多，而报人兼备学者型的，“遍拍栏杆”能有几人？

赵金铭，算我幸运，碰到这样一位学者型的报人——《今晚报》副刊编辑。

偶看电视，一经济学者在给北大学子演讲，只一句话至今明晰记得：“在座的诸位同学，你们是可以再生产的，而我们这一代是不可再生产的。”

当社会定型，就像生产线有序地运转，在严密的程序下，其产品也是定型的，这是常态下的常态产品；当社会不定型，生产生活是无序的，社会没有了一个规范，等于浇铸没了模子，产品千奇百怪五花八门——没有定型必多畸形。

“文化大革命”时代的学子，便是这样的“畸形”，不论你愿否承认，这一代人在学识上存在畸形。

“文革”开始的1966年，赵金铭十岁，小学二年级。在很多年后，这一年便是人们计算自己学习的最基本的年限。在这个门槛面前，许多人终生未迈过去，而一部分人迈过去了，走着一条“畸形”的路。

这种“畸形”常常让人发笑，这种笑含着无奈的若涩。

我和他都是1984年《今晚报》创刊，通过考试从社会上招聘而来的。他被分配到副刊部做编辑，不久，听人说他是研究《红楼梦》的，又不久，听人说，还是研究《红楼梦》的……因在两个部门很少深谈，也很少见他在本报（《今晚报》）上发表文章。直到1990年，赵金铭主编一套“夜读丛书”，约我写其中的一本，由此了解多了起来，知道他早已发表过很有分量的《红楼梦》研究论文。

本来“夜读丛书”准备出版几套的，然而第一套（四本）出版不几天，报社领导就将他和我叫去，虽未将此定性为非法活动，也是作为极不受欢迎的活动，由此“夜读丛书”夭折于襁褓之中了。

1996年，我由《今晚报》的第一版编辑调到副刊部主持工作，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将在资料室工作的赵金铭调回副刊，我至今顽固地认为，副刊编辑应是一名作家，就像美术评论家，连朱砂、大红都分不清，生宣熟宣都不懂搞哪家子评论？

赵金铭写了一组现代文人的有关文章，读后发现不是一般的平平之作、泛泛之作，而是在大量的史料积累下的“吹尽黄沙”，露出烁烁闪闪的金光。

于是定名“文坛琐记”，在《今晚报》副刊头条刊出。

王国维将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划分为三境界，李叔同将人的生活定为三个层面，在读书上也可分成三部分，第一是有书，第二是看书，第三是著书。

笔者孤陋寡闻，仅就本报而言，藏书最多的是赵金铭，其不仅藏现代的书，而且还藏善本书，对版本学有一定的研究；其看书最多，且博闻强记，对现代文学、学人知之甚多，对先秦文学有独到的研究；对于著书，赵金铭似乎不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文章有自家独到见解，属一家之言。他不是调书袋搬书橱，而确确实实在思考，读书而不尽信书，读书而不死读，大而化之，解而析之，这才是学者最可弥珍的品质。

此后他又开“重读经典”栏目,从先秦诸子切入,开启先秦文人内心深处的意识领域,第一次揭示中国文人诞生的动力原点,由文人而及君王及社会,确立了一套新的先秦研究思路,同样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

我们承认,现在是一个浮躁的时代,躁到只能读图不能读字了,但这些并不妨碍有人在文化废墟上找寻残留的气息,也更激发人在文化沙漠中苦觅那一泓清水一簇绿草。所以,余秋雨热、张爱玲热……毕竟给读图时代,吹来阵阵“逆风”,让那顺风躁动的人流感受一下迎面而来的清冷。

从报纸问世那一天起,报纸副刊中立起一位又一位的学者,报纸副刊中走出了一位又一位的学者。但在如今厚报时代,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从雕章镂句咀字嚼文和钻故纸堆中“解放”出来,加入到厚报信息的喧嚣声中,这是一个生产报人、生产媒体巨鳄的时代,还有几人耐得寂寞,板凳要坐十年冷向学者靠近么?

有,但很少,赵金铭或算其一吧。

报人,学者,这是两个筛子,有的人在时间的颠簸中被筛掉了,连报人都算不上;有的以自身的厚重被留在学者这一层面上,这不是侥幸,更不是自诩,它需要用学识用作品作证言。新闻价值和学术价值是两架天平,砝码不一样的。读读这本《闲弹中国文人》,以上这些话大概都会成为赘言。

是为序,愧为序。

目 录

序	刘泽华(1)
他在报人和学者之间	姜维群(3)

第一辑 谈先秦文人

文人的诞生	(3)
用士的理论	(6)
入仕之途	(9)
士无定主	(13)
再说“士无定主”	(17)
道家有主吗?	(20)
民本思想?	(23)
孔子的选择	(26)
孔子的有备入仕	(30)
孔子的游说	(35)
何以“知其不可而为之”	(39)
文人之于士	(42)
孔子失败对文人的启示	(47)
儒家的分化	(51)
关于子张之儒	(56)

关于子夏之儒	(62)
所谓礼贤下士	(66)

第二辑 谈现代文人

梁启超“腰子”引发的争辩	(73)
“恋爱大家”	(75)
一颗滑过天幕的流星	(77)
鲁迅所写下的一篇奇怪文章	(79)
“诗怪”李金发	(82)
诗刊与“三一八”惨案	(84)
珞珈三女杰	(86)
苦命的女作家	(89)
胡适对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态度	(91)
“创造社”发行股票	(94)
郭沫若郁达夫发泄醉一回	(97)
林语堂画“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	(100)
“泪浪滔滔”引发的轩然大波	(104)
徐志摩和林徽因的情诗	(107)
郭沫若为什么没有加入文学研究会	(110)
郭沫若与茅盾的论战	(113)
陈西滢其人的性格特点	(116)
胡风为萧红小说起名《生死场》	(119)
周作人心中的“两个鬼”	(121)
鲁迅为什么没获诺贝尔文学奖	(124)
说一点“新月派”	(127)
胡适和“三个火枪手”	(130)
梁实秋对五四新文学的全面否定	(133)
“问题与主义”之争之我见	(135)

周作人对鲁迅的理解	(138)
胡适的改业	(140)
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为什么选择白话	(143)
自我为难的胡适	(146)
随笔一点张爱玲	(148)
走进雪林	(151)
关于敬隐渔以及他所引发的一桩公案	(154)

第三辑 随笔文人

关于诺贝尔文学奖的随感	(163)
随笔三则	(171)
他曾给中国人一种新眼光 ——严复译《天演论》百年	(175)
感悟陈寅恪	(178)
千年杜甫	(189)
我看屈原：一个人格	(193)
由王小波谈到的	(197)
中西文化中一个观念的比较	(200)
能否触动国民精神的那一根神经	(202)
现实主义的“间隙量”	(205)
因读《时间简史》所扯出的话题	(207)
后记	(212)

第一辑

谈先秦文人

文人的诞生

我以“文人的诞生”这一题目,作为这一组文章的开篇,其意是想理清中国文人在最初是如何诞生,以及在诞生之后形成中国文人这一群体所具有的精神特性。这个立意按一般的研究路数很符合学术规范,不过当我重读先秦典籍时,却惊讶地发现,中国文人的诞生与形成是在一个乱世,而且这个乱世又特别长,包含了西周末期和整个春秋战国时代,有着六百多年。因而,我原先的那个立意过于简单了。在这长长的乱世中,中国文人诞生,形成,并最终具有能传承后世的精神特性,一定相当复杂,按一般的研究路数弄不清这些复杂的问题。比如,今天,有多少人能把中国传统文化说清楚呢?所以要用新的方法。对我而言,这新的方法,就是跟着历史真实走。

我想,多么复杂的问题,它都有一个最初的起点,复杂只不过是这个最初起点的结果。倘若我们从复杂的结果沿着历史往回溯,找到这个最初起点也就找到了研究的基点。中国文人的精神特性无论有多么复杂,在他们刚一诞生,必定会有一个最初的起点。我很幸运,我在春秋战国众多诸子的脚下,找到了这个最初起点。站在这个最初起点上,看他们走过的路,就能明了中国文人是怎样的一个群体,他们具有怎样的精神特性。中国传统文化又是怎样的一种文化。

关于中国文人的最初起点,我将在第二篇文章中谈到,也是为了明了中国文人的最初起点,在此必须先谈清中国文人的诞生。

在西周末期以前,中国文人并不存在,存在的是掌握文化知识的

官,可以简称为文官。这些文官是夏、商、西周王朝官府中官的一部分。按孟子所讲是“仕者世禄”,因而他们的文化知识属于王朝官府并为王朝官府所用。从最早的成文资料甲骨文中,能看到文官的许多称谓,诸如“巫”“卜”“多卜”“贞人”“乍册”“史”以及“大史”“小史”“东史”“两史”等,这些都是官名。甲骨文中的“巫”字,是两个“工”字以直角交叉重叠,《说文》释“工”与“矩”相通,“巫”即是操“矩”测天地的人。既然能操“矩”测天地,也就具有一定的技能和解释天地鬼神的知识。至于“卜”“祝”“贞人”等都与天地鬼神相联系,与“巫”同类。与“巫”的职能同等重要的还有“史”,“史”字是手中执一“中”,“中”为笔,表示记载。

由此可见西周末期以前王朝官府中文官所具有的两个特性。首先,“巫”“史”与天地鬼神具有同构性,也就是说没有鬼神也就不会有“巫”“史”。在迄今挖掘出的许多考古遗址中,敬鬼神事比比皆是,《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侍神,先鬼而后礼。”在整个殷商时代,王朝官府都相应地存在着一大群“巫”“史”文官。这些文官与鬼神相通,是鬼神在人间的代言人,因而也就掌握着文化知识。在那个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年代,有了知识就有了权利,所以“巫”“史”就有了第二个同构性,与官的同构性。如夏朝的官名太史(掌管记事),羲和(掌管历法),瞽(掌管祭祀)等。再到商,文官大体分为两类,一为“巫”,二为“史”。掌管着记事,占卜,祭祀,辞告鬼神的事务。西周的文官大体也与夏、商相同。因而,西周末期以前文官具有的这两个特性,决定了他们只是王朝官府中的官。他们手中的技能和知识是官的职能,他们终身被王朝官府所豢养,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文人群体。

自夏、商直到西周末期,这批被王朝官府豢养的文官,终于走到他们世袭世禄的终点,遇到了乱世。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中对这乱世的起因,一口气历数“昭王之时,王道微缺”,穆王在位,“王道衰微”,“懿王之时,王室遂衰”。到了周夷王时,四方诸侯有的来朝,夷王朝不敢坐受朝拜,要“下堂而见诸侯”。这种诸侯强大王室衰微的局面,成了天下大乱的主因。在夷王之后,出现个厉王,就是《国语》中记载的那个“防

民之口甚于防川”，能使“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的残暴厉王。厉王之后，虽有点宣王中兴，但紧接着又来了一位宠美人而戏诸侯的昏乱幽王，天下大乱由此而起。

西周末期而起的天下大乱所造成的是以往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整个地坍塌了，这场大乱也没因周平王东迁而告结束，直到孔子生活的年代，仍然是“天下无道”“礼崩乐坏”。自夏、商、西周以来，一直是“仕者世禄”的文官，被天下大乱无情地抛出了做官的轨道。司马迁说：“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故畴人子弟分散，或在诸侯，或在夷狄。”他自己的祖上就世代在周朝做史官，在天下大乱之中，“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流落四方了。¹

西周末期而起的天下大乱，今天我们怎样估计它的剧烈都不为过。别说是文官被抛出了王朝官府的门槛，就是世袭的贵族也被抛进了平民阶层。《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记载，太史墨感叹地对赵简子说：“三后之姓，于今为庶。”《国语·周语下》也说：“天所崇之子孙，或在畎亩。”王室贵胄都成了种田人，可见当时社会的动荡是何等剧烈。

也就是在这剧烈的动荡中，中国文人诞生了。他们诞生在一个“天下无道”“礼崩乐坏”的乱世，他们刚一诞生就发现自己成了除脑袋中留有学识和智力之外的一无所有者，用孟子的话是“无恒产”的人。然而也就是这样的人，才是纯粹的文人。他们被抛出王朝官府落到民间，也就是与政治权利从此分离，从而第一次拥有了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再也不靠世袭世禄生存，也同时有了行动的自由空间。而这些，“巫”“史”全不具备。虽然中国文人诞生在一个乱世，但由于他们具有了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又由于那个乱世给了他们自由的空间，他们很快就形成一个文人群体，站在他们诞生之后的最初起点上。

注释

1 参见《史记·太史公自序》

用士的理论

春秋战国时的诸子文人们，把欲富贵、恶贫贱说成是人的本性，又从这本性中推论出文人的入仕也是本性使然，从而就把文人诞生后的最初起点定在入仕致富上。虽然这是贫贱的逼迫，不过他们在理论上的确花费了一番力气。但这也只是一厢情愿。你想入仕致富，可决定权并不在你，你有学识有智慧，你也有满脑子的治国良策，可用不用你却在各诸侯国的国君等当权者。对于诸子文人们，国君等当权者用不用之，是他们在遭遇到贫贱之后所要面对的第二个生存难题。

孔子曾带众弟子去齐国求仕，却碰壁而回。齐相晏婴对齐景公说：“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居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¹孔子自己和他培养众弟子的目的就是“入仕”“从政”“为宰”，可现在齐景公和晏婴都不用他们，那又奈何？因而，创造出一套用士的理论，并让国君等当权者认识到用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孔子等诸子文人们来说，就显得十分必要。

所以，季氏的家臣向孔子问政，孔子就脱口而出：“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²“举贤才”广而言之就是用士，狭义所言是指盛德之士。如孔子说“殷有三仁焉”：微子，箕子，比干。还说：“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騶。”³孔子举出的人物大多是盛德之士，这样的士对文人而言标准是太高了，修炼到这种程度再去入仕似乎又很漫长。所以，到了孟子那里，就把贤才的标准降低到君子或干脆到士。魏人周宵问他：“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